

評估韓戰前後杜魯門對華政策

邵宗海

(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副教授)

一、概論

一九五〇年，對美國和中華民國的外交路線之取捨而言，都可謂是相當光怪陸離的一段時期。

六月二十五日爆發的韓戰，可謂是這兩種絕然不同的時期的分水嶺。在此之前，美國不但以公開發表白皮書的方式拋棄了中國，這也導致日後中國大陸淪陷的部份原因，還重申了台灣主權應屬大陸的論調。①這意味著，即使中共可能攻佔台灣，美國亦無意介入未來中國的內戰衝突。但是韓戰的爆發，美國原來對中國國民黨所採的立場，幾乎在一夜之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就在韓戰爆發的兩天之後，美國發表了協防台灣的聲明。隨之而來的就是大量的軍事物資和援助湧入台灣。雖然有此意外之助，可是台灣前景仍因各種未定的變數而致未決。

由於在一九五〇年美國對華基本政策的改變，衍生了三個問題：

- (1) 在韓戰爆發之後，美國是基於何種因素而致對國民政府在態度上產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 (2) 在韓戰爆發之前，國務院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但到了六月二十七日，就在韓戰爆發兩天之後，美國改變了其態度，並轉而處於應依國際法視台灣當前的狀態為未決之立場，為何？
- (3) 美國一九五〇年的對華政策是如何制訂的？

本文的目的就是爲了要回答以上這三個問題。同時還希望能簡單扼要地，將一九五〇年美國對華政策的真相予以摘要說明。

註① 細節請看 U. S. Dept. of State,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67)

二、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前美國對華政策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在多種場合中，對於平等的貿易機會，和保持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一直是採用雙重原則，尤其是在表示「門戶開放政策」上。雖然它也表示過「：不干預中國內政的政策」，^②可是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仍有涉及協助國民政府對抗共產黨勢力擴張的行爲。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中美之間簽訂了將美國政府在太平洋各島上的剩餘物資賣給中國的協定，其中說明這個事件的最佳例子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表的聲明，攻擊美國企圖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給國民黨政府。^③

由於共產黨勢力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不斷地坐大，使得中國大陸的情況發生重大的改變，然後造成美國政府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在態度上的完全轉變。由於迫切地希望能結束中國的內戰，國務卿丁艾奇遜（Dean Acheson）發表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白皮書」，其中特別強調了過去五年來的作法，他在文中強調說：

「：我國（美國）在能力所及的合理限制之內，未曾亦從來不曾行使過任何可能改變此種結果的行爲；我國亦未因所未發生之行爲而對此結果造成影響。此結果完全是因爲中國內部的軍隊所造成，我國曾試圖予以影響，但並未付諸實行。

」^④

艾奇遜很清楚地瞭解「共產黨公開宣稱其係附庸於外國的強權——蘇聯，過去五十年來，無論在沙皇時代或共黨時代，該國均無所不用其極地企圖取得對遠東的控制權。」但是在面對這種干預的問題上，他表示：「我們必須面對既成事實的情況，是再清楚也不過了。我們不會根據我們的既定政策去協助中國，甚至我們自己。」^⑤

從這份白皮書上似乎即可看出，共產黨將被暗示會在短期內取得中國大陸的控制權。而實際上在白皮書發表後不到二個月內，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建立了政權。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魯門總統發表了一份聲明，企圖沖淡美國國內日益增高的要求華府干預的要求。他重申美國會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ugust 1949, pp. 1-10.

^③ 同上書 - p. 180.

^④ 同上書, p. 15.

^⑤ 同上書, p. 16.

支持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發表的開羅宣言，和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發表的波茨坦宣言，這兩份宣言中都保證會將台灣歸還給中國。他說：

「美國無意於染指台灣或任何其它中國的領土。美國目前無意在台灣獲得特殊的地位或特權，或建立起軍事基地。亦無任何使用其武力來干預目前狀況之打算。美國政府不會採行任何可能造成干預中國內戰的作法。同樣地，美國也不會提供軍事援助或顧問給在台灣之中華民國軍隊。」^⑥

在同一天，國務卿艾奇遜在記者會上發表了比杜魯門的聲明所反映之意見還要強硬的看法：

「中華民國已統治台灣達四年之久。美國以及其它盟邦對這種統治和佔領，甚至都不曾過問。而在法律上，台灣為中國的一個省份是任何人都毋庸置疑的。這個問題大可以依法處理。」^⑦

除了早先發表的「白皮書」以外，這兩份聲明都反映出了美國將保持其不干預中國內戰，並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之政策。

這種造成美國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之間的緊急狀況到底是那些因素，已成爲歷史學家深度關切的問題。我們可以集中以下所述的各項因素並予以分析後得知。

首先，國民黨於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在戰場上軍事行動的失利，造成了美國政府不但打算宣稱中國共產黨已經贏得了在中國大陸的控制權的結論，還迫切地想證明中國國民黨已經垮台。

艾奇遜在一九四九年的白皮書上，很清楚的說明了美國政府將不會支持或「協助一個已失去自己的部隊和人民之信心的政府進行全面性的干預」，以阻止共產黨接管大陸。^⑧

此外，艾奇遜還提及美國不會幫助中國國民黨的其它原因，係出自「其（國民黨）政府的失敗，反映出了他們所欠缺的是什麼，它的愚蠢和盲目摧毀了它自己的信心和外援。國民黨政府並不是因爲軍事上的失利而丟掉了中國，它是因爲本質上的懦弱和失去了民心才會瓦解的。」^⑨

國會山莊中的某些議員與艾奇遜的部份意見持同樣的看法。像亞瑟·范登堡（Arthur Vondenberg）這位原則上並不反對支持國民黨的共和黨參議員，於一九四八年承認說：「以我們的力量所能創造的奇蹟是相當有限的」。一年之後，他又

註⑥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16, 1950, p. 79.

註⑦ 同上書 - p. 80.

註⑧ *U. 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 - 48*, pp. 15 - 16.

註⑨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March 27, 1950, p. 468.

補充說，在中國「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時代性的難題」。⑩另一位就是民主黨籍的參議員湯姆·康納利（Tom Connally），他更直接地指出，對蔣介石再提供更多的支援，將會像是「把錢丟進老鼠洞去一樣」。⑪根據他們的看法，把美國的資源浪費在一場已打敗的戰爭上，簡直是白癡的行徑。不過另一方面，美國政府當時仍督促國會通過在歐洲建立起一道反共產黨的屏障，使美國在歐洲得以充分地倚靠既犀利又強大的盟軍。這種重歐輕亞政策，加上對付同群共產黨却在不同地區採不同的措施，的確令人對美國政府的舉動深感不解。

其次，由於承受了美國國內政壇對先總統蔣公支持者的壓力，杜魯門本人，對蔣氏或多或少的產生了一些敵意。下面的一些分析也許可更詳細說明這樣趨勢的發展。

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中國問題成爲美國政壇上區分黨派的主題。一九四七年，杜魯門政府受到了指稱其對共產黨的表現太過「軟弱」的攻擊。一群共和黨籍的參議員和衆議員，批評杜魯門首先從招請共產黨員加入聯合政府所反映出的理念。接著在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離職之後，又批評其並未盡力協助蔣氏擊潰共產黨。一九四八年，更多的批評家紛紛要求杜魯門來「挽救」中國。其中塔虎脫（Robert A. Taft）這位由威斯康斯州選出來的共和黨參議員，提出強烈的要求說「遠東的和平，比我們未來在歐洲的和平還要來得迫切和重要。」他還同意軍援台灣，並暗示杜魯門應該做得更多。^⑫

一九五〇年一月，塔虎脫加入了高聲疾呼政府不應放棄東亞政策的共和黨人行列。塔虎脫聲稱美國應派遣海軍協助國民政府防守台灣。這樣的政策所費不高，而且還可以順應美國人民遏止共產黨勢力進一步擴充的願望。^⑬

另一方面，於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間，杜魯門成功地提出了他的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和在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軍事聯盟，以擴大軍援及經援的方式，阻止共產勢力的人侵。在兩黨以及民間的蔣氏支持者都感覺到奇怪，爲何未能像在面對歐洲的威脅一般，以全副力量阻止中國共產黨可能贏得的勝利。

杜魯門在他的官方文件和私人回憶錄上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他對爲了中國事務向他游說的說客所施加的壓力是曾感到不滿，進而是否就遷怒於蔣氏，是件值得探討的可能方向。在杜魯門的口頭自傳中，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出來杜魯門總統對

註⑩ Michael Schall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Oxford, N. Y.: Oxford Univ. Press, 1979, p. 118.

註⑪ 同上書，p. 118.

註⑫ 有關共和黨對杜魯門政府的批評，請見 James T. Patterson, *Mr. Republican, A Biography of Robert A. Taf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72, p. 438.

註⑬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1950, p. 1.

蔣氏有多麼的不滿。他說：

「……（國民黨政府）一點也不好，從來也沒有好過。我們送給他們將近卅億五千萬美元的物資，送到所謂的自由中國，然後從北平到南京之間大約有五百萬蔣氏的部隊，向為數僅卅萬的共產黨投降，然後共產黨就利用這些物資將蔣氏和他的部隊趕出中國。他們要我派出大約五百萬美國人去救他，我才不會這麼做呢。怎麼樣也救不了他了，他只要等敵人來了就會崩潰。我不會浪費任何一個美國人的生命來救他的，而且我也不管別人怎麼說。他們對我叫囂，對我吶喊，還一直說我對共產主義軟弱和什麼都不懂。可是我絕不會對這些人屈服的，同時我對蔣和他的那幫人的印象也絕不會改變的。他們這些該死的傢伙每一個都應該關到牢裏去，而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還能看得到。」^⑭

對於國府的支持者，杜魯門說，國民黨從美國送給蔣氏的卅五億美元中「偷」走了七億五千萬美元，而這筆錢又正是被這些所謂的「中國說客」所花掉的，而且他們還正在花用。^⑮

由此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杜魯門在韓戰爆發之前，對於國府所給予精神上或進一步在軍事上的支援，事實上都是相當不情願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對蔣總統 蔣公個人可能存在的恨意，可能是導致了他對國府支持削弱的部份關鍵所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決定性的因素在於與美國的國家利益攸關。杜魯門政府所採行的對華政策，是國務院根據美國在遠東地區所能獲得的國家利益所制訂的。由於國民黨政府被迫遷往台灣，美國對這個小島不予援助的政策就是顯而易見的了。其主要原因為：(1) 衍生自對中國的內戰不予干預的政策，和(2) 評估台灣在太平洋中無戰略價值。

邁克·史可洛 (Michael Schallor) 對前者有很完整的說明。在他所著的廿世紀的美國和中國一書中，他說：

「美國拒絕與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却願意繼續視退處於台灣這個小島上的蔣氏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不過此時美國亦未曾承諾協防台灣，以應付共產黨可能發動的攻擊。很明顯地，杜魯門和艾奇遜是計畫要讓中國的內戰在沒有美國的直接干預下作個了結。」^⑯

喬治·肯楠 (George Kennan)，這位制訂「以歐洲為主導」計畫的策劃人中的代表性人物，也在政府官員中進行了密集的游說，認為美國不應對中國的內戰再作進一步的干涉。雖然他也相信中國共產黨多多少少是受到了克里姆林宮的驅策，但肯楠仍存著中共會基於「民族主義」的因素，而對蘇聯的影響力予以限制的幻想。這意味著華府已作好與未來的中國共

註⑭ Merle Millor, *Plain Speaking on Oral Biography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3, pp. 282 - 283.

註⑮ 同上書，p. 289.

註⑯ Schallor, *The U. S. and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p. 125.

產黨政權打交道的彈性戰術運用的準備。¹⁷

至於台灣在太平洋地區戰略價值的評估，則在國務卿艾奇遜和諾蘭（Knowland）史密斯（Smith）二位參議員所作的會談備忘錄中強調過了。艾奇遜說：「：我對台灣的戰略價值作過了一些研究，並發現此島與中國大陸的距離只比琉球多了四十海里，比菲律賓多一百六十海里，以今天的空中武力優勢情況而言，兩地之間的距離實在說不上有什麼差別。」¹⁸

不過最有影響力的資料來源，還是由國務院所提供的建議，尤其是喬治·肯楠所提出的戰略觀念。國務院考慮的方向是

(1) 中共對蘇聯的安全，和對在莫斯科控制下的國際共產黨活動所能構成的威脅，比美國要來得有力。¹⁹

(2) 中共有可能追隨狄托（Tito）的脚步，成為莫斯科所控制的衛星國家中的另一個異議分子。這種信念係出自國務院的中國事務專家經過長年的瞭解所得，他們認為毛澤東的革命行動並不是依靠蘇聯而獲得成功的，而且莫斯科也並未能有效控制毛澤東政權，因此之故，事實上也可能不會讓蘇聯對中國大陸有染指的機會。²⁰

(3) 以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利益而言，照肯楠的看法，日本比中國要重要得多。美國應集中力量於建設日本和菲律賓，使其成為抵抗蘇聯擴張的親美堡壘。無論是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國民黨贏得了中國，對美國的安全都不會造成威脅，對美國之抵制蘇聯也都不會有什麼幫助。依肯楠的看法，亞洲大陸只是冷戰的緩衝區，而真正的重點還是應該放在歐洲。²¹

三、一九五〇年韓戰後美國對華政策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發的韓戰，乃是美國對台灣的態度由負面轉為正面的轉捩點。美國政府從基本上改變了其對台灣的政策。在六月二十七日發表的聲明中，杜魯門總統表示：

「：我已下令第七艦隊要阻止對台灣所作的任何攻擊行動。基於我的這項行動，我在此呼籲在台灣的中國政府，應停止

註¹⁷ 同上書 - p. 119.

註¹⁸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 S. Diplomatic Paper*, VI (1950),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260~261.

註¹⁹ 同上書 - p. 262.

註²⁰ 同上書 - p. 68. 舉例來說· John Carter Vincent to Marshall, 1947, FR VII, p. 809. O. Edmund Clubb to Marshall, August 28, 1947, pp. 264~65.

註²¹ 同上書 - p. 266.

其於空中及海上對中國大陸的攻擊行動。第七艦隊將會負責督導此事。台灣未來狀態的決定，必須等到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全之後再說，也就是等日本和平的完成重建，或依聯合國所作的考量而定。」^{②②}

一九五〇年八月，美國重新開始對中華民國進行武器運送。一九五一年一月和二月，美國同意提供軍事援助和顧問團到台灣。這項美國提供援助的重要承諾，暗示著美國仍然樂意承認國民黨意圖收復大陸合法地位的願望。從另一方面來看，對民主政治的訴求，尤其是當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共參與韓戰之事曝光之後，已不僅止於希望台灣不致戰敗，而是更進一步的希望中華民國能利用台灣作為光復大陸的基地。

美國對中國的狀況再度作積極的參與；對中共的敵意加深；而中國問題很快地也變成了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話題。戰爭導致美國與中共之間發生直接的衝突，並使兩者之間的仇恨與日俱增。

由於戰爭所帶來的影響，美國開始發展出新的對華政策，而其出發點似乎特別著重於兩個層面：(1)美國不會讓中共從事任何軍事犯台的行動；(2)美國考慮到台灣的法律地位尚在未定之數。與美國政府在韓戰之前的態度相較之下，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態度上與政策上是有了急遽的轉變。在韓戰爆發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因為那些因素而產生了如此戲劇化的轉變呢？

首先，美國所最關心的，也是它的國家利益。由於在韓戰中與中共之間所引發的衝突，美國和中共均將對方視為會對自身的基本安全利益造成嚴重威脅的對手；在中共方面，就是其本身的國家安全和與其緊鄰的共產國家的安全；在美國方面，就是亞洲所有非共產國家友邦和盟邦的安全。戰爭爆發之後，美國所制定的政策乃是對中共所造成的壓力予以圍堵、孤立及驅逐，進而達到削弱其勢力之目的，而中共則進行無情的攻擊，以圖埋葬美國在整個東亞的地位。

韓戰爆發的六個月之前，國務卿艾奇遜曾說：「……我們在遠東地區的部隊，可能會在不可能成功和令人不悅的情況下，遭到攻擊，因此美國必須在任何可能的地區內，擁有任何行動的充份自由，以期維護美國自身的安全。」^{②③}因此，杜魯門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派遣第七艦隊至中立的台灣海峽的決定，其目的可視為是爲了保護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國家利益的舉動。這一點可由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國務院拍給美國駐華大使的電報中得證，在電文中艾奇遜要求史壯，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館總領事兼大使館負責人，傳話給先總統 蔣公；艾奇遜說：

「北韓部隊對大韓民國所發動的攻擊，造成了有關亞太地區安全方面的問題，爲此美國有鑒於對日本和對此地區整體性

註②②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50, p. 492.*

註②③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16, 1950, p. 81.*

和平之責任，實不能等閒視之。

職是之故，美國第七艦隊已奉派阻止任何由大陸對台灣本島所發動之攻擊，且所有必要之部署均已完成。」²⁴另外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從參謀首長聯席會呈交國防部長的一份備忘錄中，更深刻的顯示出美國的利益與台灣有相當重要的相連關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曾就台灣在整體性世界局勢，特別是遠東的局勢中所佔地位之層面，相對於美國的軍事立場作了一番檢討。並強調他們的看法說：

1. 對美國而言，台灣島的戰略地位至為重要（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致國防部長備忘錄）；2. 台灣淪入共產黨之手所造成的戰略性後果，將對美國的安全產生極為不利的嚴重影響（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國防部長備忘錄）；3. 國民黨抵抗共產黨所獲得的持續性成功，尤其是在台灣地區部份，對美國的軍事利益大有助益（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致國防部長備忘錄）；及4. 因戰爭本身在未來所發展出的情況，很可能會造成對台灣公開的軍事行動，而對我們整體性的國家安全立場造成影響（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及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致國防部長備忘錄）。²⁵

來自國內外政治界贊成協防台灣的說客，也對杜魯門政府造成相當可觀的壓力和影響力。韓戰爆發之後，台灣海峽的局勢有了改觀。部份功勞是來自眾多支持中華民國的遊說人士。在這些說客當中，麥克阿瑟將軍可說是使美國對華政策變得有利於台北的轉變中，佔有決定性的地位。他刻劃出了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其對西方理想的政治層面的重要性。他說：「毫無疑問地，當前台灣的命運與美國息息相關。」在他的備忘錄中有以下這段話：

「台灣尚未淪入共產黨之統治。對於中國國民黨的部隊以其目前的編組和裝備，是否具有能力和鬥志來保衛台灣免於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受到侵略方面，尚有各種不同意見的報告。我無法預測要抵擋共產黨統治這個小島所需的花費為若干，但我已針對如有可能發生這種狀況，將可能需要之費用呈報給了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不過我對目前的狀況已感到滿意，因為一旦台灣落入一個不友善的政權手中，對美國將會是一種程度最為嚴重的災難，而我相信這只是時間問題。我深信遠東地區總司令應獲授權及受命，毫不遲疑地對防止共產黨勢力入主台灣之軍事、經濟和政治上的需求展開調查，並根據美國對台灣之國家政策，對此調查之結果予以分析並採取行動。」²⁶不過艾奇遜對於麥克阿瑟將軍在一九五〇年之前，對台灣的利益問題從未發表過意見而略有微詞。他回憶當初與麥帥就

註²⁴ *Foreign Relations Paper, 1950, Vol. II, p. 188.*

註²⁵ *Foreign Relations Paper, 1950, Vol. 6, pp. 391~92.*

註²⁶ *Foreign Relations Paper, 1950, Vol. 1, p. 366.*

「我國抵抗來自亞洲之侵略之防禦線」為題進行討論時的情節，而且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的記者會上時，他提及麥帥始終未跟他談到這個小島。艾奇遜的結論是：「……麥帥並不是沒有聽說從美國傳給他的政治報告，尤其是出自共和黨右翼人士的報告，在這些報告中提及我們的遠東政策是不合時宜，並偶而提及麥帥將是一位最具有領導者氣質的領袖人選，惟有靠他才可能將可憎的民主黨趕出白宮。」²⁷

艾奇遜的話不僅是批評麥帥及其在國內的共和黨同夥，指稱他們企圖協助台灣在不受共產黨威脅的情況下得以生存，還暗示共和黨在以麥帥為首來影響老百姓和政府的手法上，獲得了實質的成功。但艾奇遜的聲明中所指的共和黨右翼人士又是指誰呢？目標當然是參議員羅伯塔虎脫及他的追隨著。一九五〇年秋季，當中共渡過鴨綠江南侵時，使得許多美國人都心有戚戚焉。塔虎脫在參議院中的聲望正如日中天。他堅持「美國一定要去解除對蔣介石所施加的羈絆，並對他在韓國或中國南部的行動給予全面性的支持。」²⁸

杜魯門政府是否真正地受到了國內外說客的影響尚很難說。可是這些遊說對當局確實造成了壓力，而且在韓戰爆發之後，杜魯門政府不得不修訂及調整其對華政策，以配合民眾因對華政策之辯論及韓戰之爆發所提出的要求。

韓戰和杜魯門確保台灣安全的決定，不但改變了這個小島的軍事形勢，也造成美國在有關政治和法律立場上所採政策從基本上發生轉變。在韓戰爆發之前，國務院視台灣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但到了六月二十七日，就在北韓發動攻擊的兩天之後，美國的態度改變了，現在他們的立場轉變為，根據當前的國際法，台灣的地位應視為未決。至於台灣在法律上的地位，自韓戰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已不止一次提出所謂的台灣法律地位的問題了。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國務卿艾奇遜就台灣的法律地位問題向參議院提出了簡報，在報告中他曾談及這一點：

「我再度對台灣問題的歷史作了一番回顧，發現台灣在本質上還是屬於中國的領土，其控制權曾因日本接管了大約四十年而中斷了一段時期，但這並無礙於承認此島的主權仍應歸屬於中國，同時在開羅和波茨坦宣言中也都再度肯定了此項權力。我要指出的是，如果有人要談到適法性的問題，那麼就要回溯到與日本所簽訂的和平條約中，將台灣自中國領土之一部份割讓給日本的合法性的爭議上去了。在對這一點作了更進一步的研究之後，我要說的是，如果就血源關係之性質作法律性的爭議時，僅有其在利益上的部份與千島群島和韓國這些在太平洋上受託管的地區略有不同而已；不過就我而言，我寧可接受這些個案中已經分割的事實，坦白講，這與使用正式文件所能造成之結果差異並不大，既成的事實乃

²⁷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1969, p. 44.

²⁸ Patterson, *Mr. Republican*, p. 685.

是，只要其命運實際上仍受到早先所訂條約之約束，即應依其現行之政權及控制者，將這些地區歸屬於同一類型。接著我要聲明的是，如果我們要接受所有現行台灣有史以來即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目前實際上也是如此，那麼就必須承認其在實質上仍為中國的一部份。^⑳

自韓戰爆發之後，杜魯門政府在許多場合中，不止一次的提及台灣地位之未決。^㉑在另一方面，杜魯門總統描述他使台灣中立化的決定如下：

「爲了讓各界不致懷疑我們有染指台灣的企圖，我希望說明美國絕無將此島佔爲已有的野心，亦不要求我們在台灣能取得任何特殊地位或特權。目前台灣軍事中立的狀況，乃是不應因影響該島的政治問題而產生任何偏見。我們的希望乃是台灣不要因所包藏的敵意而影響到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而且一切有關的問題，均應依照聯合國憲章，以和平方式予以解決……」^㉒

從這些談話裏，可以明白杜魯門對台灣地位未決的主張，似乎著重於將台灣自中國大陸分割出來，以使得美國在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時候，不致被視爲是干預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台灣地位的未決，就當時來說，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而非美國對華政策真實的內涵。

四、結 論

華特·立普曼博士在一九四三年寫了一本題爲美國的對外政策：共和的後盾（*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的書，在書中他爲美國的對外政策所下之定義如下：

「……一套對外政策應以制衡爲主要因素，要能將過强的力量予以保留，並顧及國家的約束力和國力。」^㉓

弄清楚了以上所述美國對外政策的定義，便多少可以瞭解在杜魯門政府時代，美國的對華政策乃是出自以自己國家利益爲優先考慮。

首先，美國政府要降低其對中國內戰參與的程度，主因是美國想在遠東地區保有最高利益的最佳立場。原因爲：

註⑳ *Foreign Relation Paper*, Vol. 1, 1950, p. 25.

註㉑ 同上書，Vol. 2, pp. 158, 203, 351.

註㉒ *Foreign Relations Paper*, 1960, Vol. 2, p. 430.

註㉓ Walter Lippmann, *U. 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43, p. 9.

(1)中共似乎不會立即對美國造成威脅。肯楠曾說，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或是共產黨，都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³²⁾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對立中，美國採取中立的立場，將有助於在未來與取得中國大陸政權的共產黨打交道。⁽³³⁾經歷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政府和老百姓都厭倦於投入另一個戰場。避開中國的內戰最能符合美國的利益。

韓戰發生之後，美國開始瞭解，台灣乃是其在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連鎖之一環。防止台灣落入敵人手中，不但對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最爲有利，還可擾亂未來蘇聯在此地區所企圖進行的任何軍事冒險。

在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四日發給美國駐台北大使館的電報中，國務卿艾奇遜很清楚陳述了爲何美國爲了韓戰而協防台灣，以及說明了美國在促成台灣中立上能夠有何種斬獲。他說：

「：在當前的危機之下，美國的基本對華政策爲促成台灣保持軍事中立。總統於六月二十七日所宣佈的行動，目的係爲了消除或降低此具有戰略地位之小島，因韓戰所造成之危機而遭到共產黨之佔領及軍事性之攻擊，以確保在琉球—日本—韓國作戰之聯合國部隊在海上及空中之安全，並預防敵人在太平洋及遠東地區可能之進一步擴充。六月二十五日之事件證明蘇聯之勢力範圍已準備好利用一系列有計畫的侵略行動，以追求如同其在其它地區進行攻擊來製造糾紛之目標，以及蘇聯是否有意引發戰爭之困擾。我們促使台灣中立化之行爲，目的係爲干擾任何共產黨可能已定好之時間表，並將戰爭限制在韓國地區至可能獲得安全之情況爲止。」

從軍事觀點上來看，對美國而言至爲重要，作爲西方國家戰略前線的基本防衛區域，一般來說是從阿留申群島經由日本到菲律賓所延伸而成的一條島弧。由於千島群島已落入敵軍之手，若台灣之位置再落入美國之敵人的控制之下，那麼對我們目前以日本、琉球和菲律賓爲主的戰略位置而言，敵軍將可在此條戰線的正中央突破，而對我軍造成至爲不利的威脅。如果台灣落入中共之手，然後再爲具有敵意的蘇聯部隊所用，到時美軍在韓國的部隊將會遭到嚴重的包圍，嚴重的程度將會使美國在整個東、西太平洋的地位都受到威脅。此外，當聯合國部隊在韓國奮力抵抗侵略的時候，若台灣遭中共竊奪，那麼對派駐在亞洲的部隊的士氣，會產生相當程度打擊，進而對美國和其它位於西太平洋，或西南太平洋的友邦，或是在此地區擁有既得利益的友邦，造成傷害。依目前的情況來看，不讓台灣淪入中共之手，乃是我們必須視爲當前第一要務的重點。⁽³⁵⁾

註③

註④ 見註②。

註⑤ 見註①。

註⑥ Foreign Relations Paper, 1950, Vol. 1, pp. 343~435.

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須澄清，也就是即使美國派遣了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會對中共開關或擴充更多、更大的作戰前線，而且縱使當時有蘇聯在撐腰也是一樣。理由很簡單：

首先，杜魯門總統堅持要將戰爭局限在東亞地區。在他的回憶錄中，杜魯門說明了他心中最為關切的重點，並解釋了他為何要將韓戰局限為一場有限度的戰爭：

「我們的英國盟友和許多歐洲政治家，都看出中共的伎倆是打算在亞洲製造問題來拖住美國，使美國無法對歐洲的重建伸出援手。他們曉得，全世界對共產主義殺傷力最強的無過於美國的政策了；像是對希臘和土耳其的援助，馬歇爾計畫，嚴密掌握柏林的決定，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等是。只要這些政策仍在貫徹執行，並且有美國在背後撐腰，那麼克里姆林宮就永遠也休想赤化歐洲。蘇聯政策的首要之務，永遠是分化蘇聯的敵人，而在美國領導下所造成歐洲的大團結，已成了全世界共產黨必欲先除之而後快的首要目標了。」

我不希望放鬆我們對蘇聯未曾改變目標與設計方向的政策之注意力，我知道在我們這個時代裏，歐洲，以其具有精良技術的數百萬人口，以其工廠和交通網路，仍將是世界和平的關鍵之所在。」³⁶

其次，杜魯門派遣第七艦隊至台灣海峽，以使其地保持中立的決定，一方面是為了嚇阻中共可能對台灣發動攻擊，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要防止國民黨圖光復大陸，因為此舉會使原本只是地區性衝突的韓戰，擴大成爲一場國際間的軍事大戰。

另外就是與中華民國利益攸關的問題了，在對這個特別的時代作更進一步研究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有趣的重點。其中之一就是「蔣氏的支持者，像是參議員塔虎脫，麥克阿瑟將軍及其他的追隨者之類的，他們是否真正打從心眼裏支持中華民國？」艾奇遜曾批評麥帥在一九五〇年之前，從未表示過對台灣的興趣。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的記者會上，回憶說他與麥帥討論「我國抵抗來自亞洲之侵略之防禦線」時，麥帥並未提過這個小島（指台灣）。³⁷

在羅伯·塔虎脫的自傳中，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塔虎脫對國民政府所持立場方面的問題。他說：「塔虎脫在美國對侵略的應對之道這個問題上的反應，似乎有點自我矛盾。當國民政府與中共部隊作戰失利的事實已經明顯時，同時在一九四八年時，也有許多批評家都在要求杜魯門政府『救救』中國。但是塔虎脫當時從來沒有對亞洲事務關心過，當然也更談不上發表這一類的批評了。」³⁸

註³⁶ Richard Lowitt, ed.,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Chicago: Rand McHalley & Co., 1967, pp. 21~22.

註³⁷ 見註³⁶。

註³⁸ Patterson, *Mr. Republican*, p. 485.

除了以上對麥克阿瑟將軍和塔虎脫參議員所作的評價和批評以外，倒是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兩位在眾多國府的支持者當中，爲了使美國對華政策變得有利於台灣，確實是付出過影響力的人物。不過的確並無證據或資料足以證明麥克阿瑟將軍和參議員塔虎脫，何以會在一九五〇年忽然將其個人的注意力轉至台灣。

依筆者按照邏輯所作的推斷，原因是：

(1) 藉着支持台灣，麥帥可以在國府部隊的支援之下，達成其將共產黨部隊逐出韓國，甚至於中國的願望。

(2) 藉着支持台灣作爲政治話題，參議員塔虎脫可以領導共和黨在一九五一年的大選中，擊敗民主黨。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杜魯門個人對蔣介石的看法，在韓戰爆發之前對於美國制訂對華政策的影響如何？」本文前曾提及，在一九五〇年之前，甚至到後來也是一樣，杜魯門總統對先總統 蔣公的印象壞透了。他們彼此生前都從來沒有見過對方，但是這兩位先生之間所存在的敵意，似乎比預料的還要深。

至於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除了他們的個性之外，對這兩位領袖之間的關係，史迪威(J. W. Stilwell)將軍可能扮演了頗爲重要的角色。一九四四年，史迪威因無法與蔣和陸相處而被召回美國。在他晉見杜魯門總統時，他對蔣作了一些不實的批評，造成杜魯門對蔣氏的第一印象頗差。⁹⁹後來，杜魯門總統憎恨蔣公的心理未曾消除，他一直不願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政府。他甚至還說，絕不再花一分錢及再送一個美國人去幫助中國對抗共產黨。我們無法衡量到底杜魯門總統個人對蔣總統的觀點與一九五〇年之前制訂美國對華政策有何關連。但身爲一位美國對外政策的最終決策者，兼爲美國三軍總司令的杜魯門總統，在他當政的將近四年期間，因他對蔣氏的印象欠佳，確實應是使美國對華政策偏離常軌的最大關鍵所在。

*

*

*

註⁹⁹

有關史迪威將軍對蔣公之批評以及對美國政府產生之影響力，可參考梁敬錚著史迪威事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出版。

Chang - Hal P. Shaw, *The Role of the U. S. in Chinese Civil Conflicts, 1944-1949*, Bakersfield, CA: Charles Schlacks Jr., Publisher, 1991.